

第 二 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
——从卢沟桥事变
到武汉沦陷

(1937 年 7 月 ~ 1938 年 10 月)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h.com

第一章

全面抗战的爆发

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

一、卢沟桥的枪声

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订《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4月中旬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会议,阴谋侵占华北。6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以对苏作战的军事观点来判断中国目前的形势,如我们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一击。”^① 驻屯华北的日军骤增,剑拔弩张,寻衅挑战,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的乌云。

①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351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起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日本陈兵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下辖河边正三混成第4旅团6000余人,分驻北平、通县、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及山海关等要地,又扶植汉奸殷汝耕伪保安队盘踞在冀东通县、顺义、昌平、怀柔、密云一带,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为首的伪蒙军驻扎在察东地区,日伪军对北平已形成包围之势。卢沟桥距北平前门15公里,属宛平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东面7公里是丰台,为平汉、平绥和北宁三条铁路交会之地,是通向平津、保定的要衢;西南6公里是长辛店,为平汉路北段的要镇,华北诸铁路修车厂和材料厂都集中在这里。自1936年9月日军进占丰台,便对该地区形成巨大的威胁,他们可以随时截断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之间的联系。因此,日军如果进而占领卢沟桥地区,则北平将失去任何屏障,形同日军囊中之物。

日军对华北志在必得,在“华北分离”的政治谋略遭到失败后,华北驻屯军迫不及待地宣称:“为了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而行使武力,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①1936年日军在华北大量增兵后,频繁制造事端,不断加剧华北紧张局势,到1937年夏,形势更加咄咄逼人。日本政府及军部分别派神秘人物大谷光瑞和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等人到华北调查。6月30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派驻北平的一个特务曾对人说:“一星期以内,如果不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就把我的脑袋给您。”7月1日,同盟社记者在天津向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近期内北平将会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态。桥本回答说:“您的担心是对的,但是……我认为第29军方面是不会挑衅的,学生们的骚动也不过如此,闹不起大乱子来。实际上不如说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些野心勃勃想捞一把的人渴望着闹事,在天津散布种种谣言,甚至有人说:“七月七日将发生一个事件。”^① 7月6日下午,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异常肯定地对今井武夫说,日中两军将在卢沟桥发生冲突,并乞求日军不要攻击他驻北平黄寺的部分。^② 日军进驻丰台后,常常以演习为名在卢沟桥附近挑衅,从每半月一次到三五日一次,真枪实弹,昼夜不断,有时竟逼近宛平县城,模拟攻城,其用心和意图昭然若揭。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以北地区举行夜间军事演习,第3大队长一本清直在日军现场训话中,反复以“七夕”(7月7日)为题大作文章。7月7日,这个笼罩着神秘、险恶气氛的日子,一个多月来时隐时显,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日本军政人士和亲日分子关于华北特别是北平形势的谈话中。日军蓄意制造的一场阴谋开始了。晚10点40分左右,在卢沟桥东北的大瓦窑和永定河之间进行军事演习的清水节郎,“仿佛”听到几发步枪射击的声音,集合点名时又发现少了一名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日军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竟然武断地判定是中国军队开枪,且诬指所谓失踪士兵已被中国军队胁迫进入宛平城,欲闯入县城搜寻。驻城的第29军第37师219团吉星文团长,“以值深夜,日军进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值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经拒绝”。^③ 失踪士兵虽在20分钟后即已平安归队,日军仍然一再无理要求进城搜查。

① [日]《昭和的战争》(1),第8~9页,讲谈社1986年出版。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1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③ 《张志忠、冯治安、秦德纯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9日),国民政府军司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卢沟桥事变的发动是日军一次有预谋的行动。7月8日凌晨1点左右,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凌晨3点,该驻屯军竟已制定出对事变的《宣传计划》,由驻屯军主任参谋起草。该计划名曰宣传计划,实际上也包括了军事行动、特务活动及外交活动计划,全文分“正文”及“说明”两大部分,汉文译稿4000字。仅全文的要领部分就有四项八款数十条。如果事前没有充分的酝酿和细致的讨论,要在最多不超过两小时的时间内拟出如此详尽缜密的计划是不可想象的。其中有关于“要人的监禁”计划,仅对时驻山东乐陵原籍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就拟定了五种应付方案:(1)使宋迅速乘火车返回天津,否则用(2)监视其行动,使之一二日内乘飞机返津,又否则用(3)如宋不欲返,暂严密监控,再谋良策,(4)使其退避青岛,(5)万不得已时,济南特务机关长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由驻屯军负责实施。仅此一端,即可看出设想之周到,计划之细密。“要人的监禁”之第一项目标,是由北平特务机关长实施、牟田口部队援助,“立即把秦德纯、冯治安绑架到北平警备队内,不许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对照日军早在事变爆发前就对中国军队首脑的住宅和兵营、城门等目标一一勘探,制定了突袭计划等等,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个宣传计划的主要内容决不是起草者在事变后一、两个小时内的“创作”。计划还规定:“占领卢沟桥”,令日军驻津步、炮、工兵部队速赴丰台,在步兵旅团长指挥下,最迟于9日正午占领宛平县城,“要不顾忌彼我伤亡,果断实行攻击”。华北日军最高机关仅仅得各演习日军一名士兵“失踪”,受到几发不明来源、并未造成实际损害的步枪射击,即在未查明真相以进行交涉的情况下,立即作出监禁中国要人、攻占宛平城及卢沟桥这样重大的决策,显然是有预定目标和计划的。计划反复强调“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取缔言论”、“主动引导”,为此采取“收买”、“威胁”抗日报纸,“利用”、管制亲日报纸等各种手段。计划“说明”部

分特别指出,要“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的行为。但过多的强调,将陷于自我辩解”。这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要求在宣传中避免使用有可能“表示不扩大,就地解决等意图”的措辞。^①这清楚地表明,卢沟桥事件的发动,以至事件向大规模侵华战争发展都是有预谋的。

据今井武夫回忆,“卢沟桥事变一爆发……都暗地里认为这也是日本军阀企图重演柳条沟事件的阴谋。这不限于外国人,即使我国国民也认为是驻华陆军的越轨行为,虽都不敢作声,但都心照不宣”。^②实际上,不仅是一般日本“国民”,而且包括首相近卫文麿、海相米内光政、外相广田弘毅等在内的日本许多军政要人都认为是日本陆军制造的事端,特别是近卫在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曾直言不讳地对一个前华北驻屯军参谋说:“……支那事变是陆军的年轻人的阴谋。”^③至于“事端”具体是谁制造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土肥原贤二,有的说是华北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鹰二,有的说是天津特别机关长茂川秀和。其中茂川秀和最值得注意,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晚上,茂川与田中隆吉在天津一家日本餐馆喝酒时,曾向田中承认,卢沟桥事变是他组织人干的。在战后对他审讯时,他直言不讳地供认,卢沟桥边的第一枪是日本人放的,事变责任应由日军承担。^④卢沟桥日军的枪声,标志着日本将扩大侵华战争。中国守军面对强暴,在卢沟桥边燃起了全面抗日的战火。

① 《档案与历史》(总第12期),第43~48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③ [日]藤原彰等编:《昭和的历史》(5)第93页,小学馆出版。

④ 台湾《近代中国》第41期,第109~110页。

二、中国守军奋起反击

面对日军随时即可扩大侵华战争的紧急局面,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采取了严密的警戒,密切监视日军行动。1937年6月初,第29军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区的巡逻和城门的守卫,在卢沟桥一带既设阵地也增加了兵力,并对沙岗实行夜间警戒。自6月26日起,29军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由第3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守备更受重视,为加强驻守兵力,29军在这里配置了4个步兵连,并配属重机枪一连及轻重迫击炮各一连,计1400余人,其中将一连部署于铁路桥东面一带,一连配置在宛平城西南角河岔一带;第9连驻扎在宛平县城内,第10连作为预备队驻石桥以西的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安排在铁路桥西头,轻迫击炮则部署于城东门内,重机枪连分守城内东南、东北两城角。^①兵力部署完毕后,中国守军时刻警惕日军的行动。

7月7日夜,日军挑衅的消息传到北平市长兼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处,他急忙派出交涉员同日方交涉。此时,日方失踪士兵业已归队,然而日军仍然继续蛮横地坚持要进城搜查,他们一面诡称“须明了如何失踪情形,以便谈判”,^②甚至狂妄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宛平城西门,待日军进入城东门数十米后,再行谈判,一面又赶派援军包围宛平。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前往宛平城作实地调查。翌日晨5时,当谈判代表刚步入县城不到5分钟,日军即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县城,并攻占了宛平东北方的沙岗。中国守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下令还击。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①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②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8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7月8日晨,一本清直大队长下令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进行攻击,率领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主力,排成4路纵队,向驻守龙王庙及铁路桥的中国守军扑去。中日两军首先在龙王庙附近遭遇,中国守军面对具有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的日军,顽强奋战,并冲入敌群,同冲上阵地的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陷入重围,“死伤官兵180余名”,^①日军也以死亡上百人的代价占领了龙王庙铁路桥东头。与此同时,日军以另一部分兵力向宛平县城东门发起了进攻,并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

卢沟桥战斗打响后,第29军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并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抗战的决心:“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②同时,29军军部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秦德纯指示宛平守兵:“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③第110旅旅长何基沣也下达了三条命令:(1)不同意日军进城;(2)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3)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处。^④面对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宛平县城大举进犯,中国守军官兵团结奋战,冒着猛烈的炮火,连续3次打退了敌军的猖狂进攻。双方激战至7月8日15日50分,日本驻屯

① 《严宽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中国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194~195页,台北1965年版。

③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4页。

④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4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军混成第4旅团指挥官河边正三匆匆从山海关赶到丰台督战,并增调重兵进关。29军将士继续顽强抵抗,日军几次进攻宛平未果。接着河边便命第3大队在龙王庙附近渡过永定河,占领西岸,待援军到达后,9日拂晓再攻宛平城。^①8日深夜,吉星文团又施夜袭,突击队员秘密接近铁路桥,出敌不意,两头夹击,冲入日军阵地,用大刀全歼占领铁路桥的日军。9日凌晨,29军收复失地,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中国守军重新变被动为主动,沉重打击了侵略军狂傲的气焰。日军见宛平城久攻不下,为争取时间集结兵力,便玩弄伎俩,于8日深夜要求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9日凌晨,就在中国守军刚刚收复铁路桥和龙王庙后,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竟同意与日方谈判交涉,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

卢沟桥的枪声激怒了29军官兵,激怒了全中国人民。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声讨日本侵略军。中国共产党于8日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进行全面抗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援助第29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抗日活动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事变一爆发,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立即组织发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团体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29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8日下午,北平民众救亡团体冒着危险赴前线慰劳抗日勇士。北平各校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准备赴前线效力,北平工农群众也踊跃援助前线。全国各地派出大批慰劳团体,赴卢沟桥慰问抗日官兵,冀察当局每天都收到大量全国各地发来的支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陆续汇出一笔笔款项,支持抗战,慰劳29军官兵。各国华侨也迅速组织起华侨抗敌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34页。

后援会、救灾总会、华侨筹饷会等团体，捐输财力，征集药品，或亲自回国，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卢沟桥中国守军的奋起抗敌，开始演变成一场全民族的抗战。

三、中日关于事变的谈判

七七事变后，中日关于事变的谈判以军事对抗为后盾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根据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蒋介石一方面于事变发生后积极进行了军事上的调动和部署，另一方面在调兵北上的同时，又表示愿意由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本谈判，希望尽可能和平解决这次事变。7月1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议上，决定派熊斌北上，^①向宋哲元传达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指示。具体机宜是：“如宋主任因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②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宋哲元多次与日军进行所谓“和平谈判”。冀察地方当局亦相继与日本达成了中日双方三条口头协议、11月的《卢沟桥事件现地规定》。宋哲元在与日人的周旋谈判中，为谋求卢沟桥事变和平解决，对日方作了令人遗憾的让步。

同时，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一面加紧备战，一面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企盼通过外交等途径和平解决这次事变。事变的消息传至南京后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军事当局也开始考虑华北局势恶化后的应对措施。两天以后，外交部再向日方提出正式抗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原

① 熊斌曾任西北军总参谋长，与29军将领有私谊。

② 《卢沟桥事件第一次会报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防,并保留向日方要求赔偿的合法权利。^① 7月11日,再度正式声明:“中国的政策是对内推行经济建设,对外维持国际和平。对日关系,中国的政策是经由外交途径,基于平等与互惠立场,和平解决所有的悬案。”至于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中国坚持:“此次所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核准始为有效。”^② 然而日本方面的立场也相当强硬,公然蔑视南京中央政府的地位,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于7月11日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东京的立场:日本政府希望与地方当局“现地解决”,南京中央政府不能予以干预。7月12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告知日高信六郎:只要日本政府停止派遣军队来华并将已到华北的军队撤回,中国将立即停止军事调动。日本政府对此提议,没有作出正式的反应。

南京政府鉴于进行直接交涉无效,遂于7月16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东京试探调解的可能性。因日本政府坚持把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完全限制在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范围内而告失败。7月17日,日高信六郎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备忘录送至南京政府外交部,警告南京政府不得干涉冀察当局与日本军方所订协定的实行,并严词限定中国政府“立即给予适当的答复”。19日下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备忘录》,重申中国政府“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的原则立场,提议中日“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③ 还表示欢迎国际方面进行“斡旋、调解、公断”。日本对中国政府的《备忘录》极为

① 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1937~1945),第31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②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13页。

③ 《致日备忘录》(1937年7月19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6年版。

不满,日高于20日再访王宠惠。日高称:“北方问题由冀察政委会洽,此次何妨授权该地折冲。”王答:“交涉须由中央办理”,“须两方同时撤退”。同时表示:“只须有一线和平希望,中国决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①

日军以谈判为名,利用宋哲元的软弱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和平的幻想,使缓兵之计得逞。中国守军9日收复失地后,军事力量对比对中国方面非常有利,29军除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合计约有一团兵力外,在北面有西宛驻军两个旅占据着八宝山,其中一部分已进入卢沟桥西北约3公里的衙门口;在南面有第38师常驻南苑。此外,平汉线方面已从南方向长辛店增援兵力。日军方面,当时能够逐步调往前线附近的,“只有驻屯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两个大队。天津派来增援的炮兵部队,因为连日下雨,道路泥泞,被阻在通州,无法前进”。“也就是说,日本军部指挥官可能早发觉,如果开到卢沟桥的部队不寻找什么借口使之后撤,有被处于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的危险”。^②这便是日军提议谈判的目的所在。到7月16日,日军完成了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这时,日军人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之众,兵力超过10万,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18日,日军设最高司令部于丰台,由香月清司指挥。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后,便大举进攻宛平,炮轰长辛店,狂炸廊坊。19日,香月发表所谓“声明”,称20日后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宋哲元等第29军将领遂放弃一切和谈幻想,表示誓死抗战。日军大兵压境,中国方面就和平解决事变同日方进行的谈判和交涉,使中国军队尽失歼敌之良机,平津告急,华北处于危急之中!

①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6、17号合刊(1937年9月)。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5~39页。

四、冀察当局的软弱

面对七七事变的严重性,冀察当局缺乏必要的认识,对和平抱有幻想,企图通过让步,达到同日妥协从而保存实力和地盘的目的。

当时,驻守冀察和平津地区的宋哲元部第29军下辖第37、第38、第132、第143步兵师、第9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兵员总计约10万人。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一贯采取妥协政策,也由于宋哲元与国民党中央长期以来的矛盾所形成的猜疑和隔阂,使宋哲元弄不清楚南京方面的真实意图:究竟是要抗战,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妥协求和,或者是要借机派中央军北上以削弱自己的实力?因此,事变发生时,尽管宋接到报告后即刻返回,但对事态的严重性却估计不足,他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① 12日,宋哲元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合理合法地解决,同时表示愿意接受日方10日提出的道歉、惩凶、撤军等苛刻要求。^② 同一天,何应钦密电宋哲元指出:“惟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在此之前,7月9日蒋介石也曾电令宋哲元速到保定指挥。然而宋哲元以29军“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故先到津部署”^③为名,拒不服从南京政府屡次催调命令。对于南京派出的“北上之师”,宋哲元由于惧其“渐次夺其地盘”,而以种种借口,“均

① 《七七事变》,第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② 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13日。

③ 《宋哲元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14日),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令其止于河北南境”。^① 南京政府虽然派出参谋次长熊斌等一行前往解说国民党中央的方针,但由于南京方面在对日和战问题上徘徊不决,寄希望于“在华北有权力之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出面调停。^② 因而熊斌的“解说”仍然不得要领。宋哲元始终以为自己的行动是与南京政府的步调相一致的。对于南京的特使询及他与日军的谈判,宋哲元一面强调自己“向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族利益为依归,背中央意旨办理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作”。^③ 另一方面又对南京政府以往对日妥协的作法表示不满,他说:“我有决心,决不屈辱,将来即令与日人成立何种协定,必较以往之何梅协定为佳。”^④

因此,冀察当局在事变之初表现得非常软弱。宋哲元认为11日签订的秦一松协议是可以接受的,和平之门并未“完全”关闭,还要再努力交涉。他给何应钦复电称“先到天津,俟稍有头绪,即得赴保”。^⑤ 但到达天津后,即被亲日分子包围,陈觉生、齐燮元等纷纷要求他留津与日人谈判,企求和谈。为制造和平气氛,宋哲元于13日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军摩擦。为博得日本人好感,他特意将此令通报日军。

但是,日本侵略者对冀察当局的一让再让并不满足。14日夜,日军参谋又向宋哲元提出香月清司在“情况判断”中制定的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苛刻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宋哲元竟表示原则上无异议,惟希望延缓实行。随即又派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与

① 《杨宣诚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22日),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②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争史》,第5章,第24页。

③ 《熊斌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19日),见《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④ 《杨宣城致何应钦的报告》(1937年7月22日),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⑤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14日),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日方继续商谈,议定的结果是: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的营长;北平城防由38师担任,日方提出由宋哲元道谦,中方提出由秦德纯代道谦。

宋哲元的态度,一方面是在紧急关头被亲口分子包围,中了日本奸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没有认清日军挑起全面战争的真实面目,错误判断为日本人只想再次逼冀察当局让步。他想以“局部的让步”使日军中止侵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南京政府和战不定的方针,既影响了整体布局,也松懈了宋哲元和第29军高级将领的备战情绪。宋哲元对蒋介石的和战意图不了解,因此下不了应战的决心,忽略了应战的思想准备,而只在和谈上浪费时间,结果贻误了战机。而日军则利用和谈带来的时间大肆调兵入关,进行华北作战的部署。16日,日军人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约10万人以上,北平前线日军近万人,外围全落在其控制之中。^①此时宋部第29军尚分散于平津冀察各地,部队不仅未集结,反而按照日军要求,将北平的冯治安部调离,以赵登禹部换防,“企求对日示诚和平”。^②由于冀察当局在关键时刻犹豫动摇,以和谈麻痹了自己的斗志和备战意识,并下令拆除了防御工事,给北平城防留下了严重的后患。冀察当局的软弱,使中国军队丧失了有利战机。至7月26日,宋哲元发现自己中了日军的圈套,认识到“大战势不能免”,^③决定武装抵抗侵略,惜已为时太晚。日军作战部署完毕,集中3万兵力,对平津发起总攻。

① 《七七事变》,第312,中国文史出版社。

② 《严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1日),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

③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节 平津地区的陷落

一、日本决心扩大侵略

日本政府接到卢沟桥事变详报后,其内部是一片发动侵华战争的喧嚣声,并分成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持“不扩大”观点的有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及一雄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西郎等少数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则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预见到对华全面战争将是长期的消耗战,主张对中国采取渐进的侵略方式。石原是北进政策的鼓吹者,在他看来,苏联是日本对外扩张的真正威胁,因此日本必须准备与苏联进行决战。但在日军与苏军相比,苏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有一个敌对的中国在背后,日本不可能同苏联对抗。因此他认为还不到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时候。但这种意见在日本军部的影响是越来越小,日本皇族、政府和垄断资产阶级很快都认为应在对苏战争之前,首先给中国一击。结果石原莞尔本人也迅即被调离军部。

“扩大派”人数众多,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是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不扩大派”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对“南京政权首先加以一击”,除去北进背后的威胁是最上策。在他们看来,这样干,不但可以解除侵苏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利用华北等地煤、铁、盐、棉花等丰富的战争资源,大大加强对苏战备。由于长期狂热的军备扩张,国内经济不堪重负,再加上“满洲经营”计划遭到挫折,使这些垄断资本和法西斯势力的代表人物的侵华欲望更加强烈。同时,他们认为,日本如果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联至少在1937年内不可能乘机进攻日本。因为苏联外部受到德国的威胁,内部陷入“肃反”的混乱,数百万人被逮捕,数十万人被处决,甚至连远东苏军的高级军官也被牵涉进去。在这之前,1937年6月发生的乾岔子岛事件更坚定了这些人的判断。6月19日,苏军占领了苏联和伪满洲国边界附近的乾岔子岛。30日,关东军向苏军发起攻击,7月初,苏军撤离该岛。这就是所谓乾岔子岛事件。日军由此确信,苏军近期内不会向日本发动进攻。在7月11日正式作出向中国大规模增兵的决定之前,天皇裕仁曾担心“苏联从背后进攻”,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明确回答:“陆军认为苏联不会进攻。”针对天皇对苏联“万一进攻怎么办”的顾虑,杉山元说,一次派出大量军队,短期内就把中国的抗战压下去,“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①连原先被称为是“不扩大派”的参谋本部第二课也认为,如果进行以消灭南京中央政权为目的的全面对华战争,不过三四个月内就可以争取结束。^②主张扩大事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迅速成为日本政府的一致认识。

7月10日,日本陆军部决定从关东军抽出两个混成旅团,驻朝鲜军调一个师团,从本土抽调航空兵团和3个步兵师团赶赴华北战场。^③在这之前,杉山元于8日午夜下令原定于7月10日复员的40000名士兵延期复员,等于增加了3个师团的现役兵员。同时,海军也作了派兵的准备。7月11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增兵华北方案。日本政府对于派兵就意味着要进行全面侵华战

① 《消逝了的政治——近卫文磨手记》,转引自[日]井上靖著:《天皇的战争责任》,第83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82页。

③ [日]藤原彰:《太平洋战争史论》第31页。

争这一点是非常清醒的,海相米内光政在会上指出:“必须考虑到派兵等于全面战争”,首相近卫、外相广田都表示同意这个意见。米内又问:如果作了战争动员,而没有必要派兵怎么办?杉山元则回答:“不会有那样的事。”^① 内阁会议批准了陆军部的增兵方案,同时发表“声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中国方面“无接受和平谈判之诚意,终于全面拒绝在北平之谈判”,因而“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② 并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表明了日本全面对华作战的决心及准备。当天下午8时,冀察当局全面接受了日军提出的一切无理条件,由张自忠和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分别代表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协定。然而杉山元在当天夜间再度召开的内阁五相会议上表示,尽管“松井—张自忠协定”已经签字,也不能相信中国军队会履行条件,决定调派关东军、朝鲜军的计划照旧进行。

随后,日军集结重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包围北平。一路为关东军酒井镐次和铃木重康独立混成第1和第11旅团,分别由公主岭、古北口出发,经热河省向北平北侧地区集结;一路为朝鲜军川岸文治郎第20师团,由山海关入关,进犯北平南侧地区,窥视天津;第三路以天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从东侧包围北平。由日本国内所抽调的3个师团先以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经朝鲜入关,会合海军进攻天津、塘沽。7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迷惑宋哲元,一面则暗中加紧部署兵力,制定作战方案,处心积虑要消灭第29军所部。13日,香月清司制定了《7月13日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报告中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46、190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40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表示当第一批增援兵力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先以主力扫荡北平附近，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进入保定、马厂一线”。报告规定了进入华北的各部队集结位置和完成战略部署的时间。

日本陆军部认为，对华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借口中国军队北上，把对华交涉政策改变为有限期交涉。尽管中国方面一再让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狂妄叫嚣要“惩罚中国军队，铲除华北纠纷之根源”，“根据情况预计可能转向全面对华战争”。^① 他们估计，日本军队在19日前后可以完成作战部署，于是把有限期定为7月19日。16日，日本陆军部和参谋本部作出决定：“一、规定7月19日为履行期限，最低限度提出以下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责任者，包括罢免冯治安（第37师师长）；（3）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4）在7月11日提出解决的条件上，改为宋哲元签字。二、中国方面在上述期限内对我方要求事项不予履行时，我军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第29军。为此，下令动员在规定期限满了时需要的国内部队，并立即派往华北。”同时，日本军部无理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央军恢复旧态势，中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妨碍就地解决”。^② 次日上午，日本内阁会议审议了军部处理事变的对策，通过了关于现地谈判限期的决定，同时决定动员侵华日军40万人。会后，由日本驻华武官和驻华使馆参事官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通告。如此蛮横苛刻的要求，无疑是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日军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了扩大侵略战争的进攻部署。19日，日军第20师团近万人在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的率领下，由朝鲜龙山抵达天津，并以一部集结于唐山、山海关。20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抵达高丽营。至此，日军第一批增援兵力全部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77页。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79～180页。

进入华北,抵达预定地点,形成了对北平的包围态势,并在平津一带不断挑衅,出动飞机狂轰滥炸。20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备忘录》,日本难以接受,目前事态已经发生变化。同时,日本军部正式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事变”,^①并得到了内阁的批准。日本侵略军彻底露出了真面目,终于在7月28日撕毁了事变以来中日双方签订的一切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二、中国政府战与和的矛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陷入和、战两难的窘境,经历了战与和的抉择过程。它开始曾对和谈抱有幻想,后在日军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逐渐丢掉幻想,决心抗战,并在政治上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在军事上加紧部署,同时辅以外交手段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援,为全面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并相应地作了一些军事部署。7月8日,蒋介石首先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②9日,蒋介石电促军政部长何应钦由四川速返南京,筹划抗敌事宜。同日,又密令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开往保定集中,继往琉璃河开进;第40军庞炳勋部一师开赴石家庄,进驻沧县,归宋哲元节制;又调第53军万福麟部3个师附第91师前往保定集中,向固安、永清、雄县布防,第84师高桂滋部调至大同、怀来。蒋介石的部署意在使晋察绥与中原连成首尾相连的防御体系。10日,蒋介石密令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84页。

^② 《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宋哲元因热衷政治谈判，迟迟不回保定指挥，蒋便于12日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向宋哲元传达中央的抗战方略。同时要求北平方面，“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①7月17日，蒋介石命令商震部驻防黄河北岸的军队集中石家庄待命。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将大举进攻，仍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有效行动，对未来抗战采取持久战还是歼灭战，也无定案。为制定南京政府的和战方案与军事部署，在何应钦主持下，从7月11日至8月12日，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每天召开会议，研讨抗日时局与对策，共举行了33次会议。

从7月中旬开始，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对华北抗战计划提出了一些构想，主要有：（1）除抽调充足的武器弹药速运宋哲元部队外，为协同指挥，在石家庄设立行营，任命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并与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相联系，要求他们相机配合。（2）“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修筑工事，作持久抗战之准备”。如日军包围攻击上述据点，“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登禹）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②26日决心大战后，蒋介石又要求“对沧州—保定、沧州—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特别是“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的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③

① 《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1937年7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钱大钧致秦德纯密电稿》（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何应钦致宋哲元等密电》（1937年7月1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1937年7月27日），侍从室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为贯彻实施上述构想,截止 26 日,国民党军队除在平津的 29 军外,另有 5 个师已集中沧、保线,同时还有 5 个师正奉命向德(州)石线输送。以德石线为主力集中地,以沧保线为集中掩护线,并准备将沧保部队推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此外,汤恩伯师被调往张家口,增援策应。然而,国民政府此时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仍然犹豫彷徨,尤其是在日本放出“不扩大”、“地方解决”的烟幕后,蒋介石更增强了避战求和的念头,对于事变解决仍抱有很大的“和平愿望”。国民党内部对事变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对日军侵略企图判断方面,有人认为日本不愿扩大事态;有的人认为日军将大举进攻,形势如何发展,一时难以断定。在对于和战方略方面,有人主张若日方确不欲扩大事态,可以妥协,因为中国方面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不如缓兵以完成抗战任务;也有人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决心抵抗,军事准备不可忽视。在对于战争全面化或局部化方面,有人主张一经开战,必然是全面化,应实行绝交、宣战;也有人主张依现实状况,仅能局部化,不能谈绝交。^① 蒋介石对日军进攻华北仍抱有侥幸心理,十分希望西方国家出面干涉。他亲自邀见英、美、法、德外交使节,恳请他们出面调停,即“斡旋、调解、公断等,我国政府无不乐于接受也”。^② 7 月 12 日,中国驻外人员秘密询问英美两国是否愿意出面调解中日危机。英国迅速提出了一个由英、美、法进行联合调解的计划,但美国的反应十分冷淡。16 日,国民政府请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日本转达:希望中日从 7 月 17 日停止调动军队,以逐步实现和平。同时,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军行至保定一线后亦奉命停止前进。

中国政府战与和矛盾的根源是其“应战而不求战”的指导思

① 《卢沟桥事件第四次会报记录》,《民国档案》1987 年第 2 期。

② 《中国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 203 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想。这种思想的出现乃在于蒋介石的“最后关头”的界限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但毕竟还没有突破,日军尚未攻占平津,和平妥协还存一线希望。“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蒋介石不会放弃寻求“和平”的努力,这是蒋一贯的对日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第一次公开了总是含糊其词的中日关系“最后关头”的界限,意在引起日方对卢沟桥事件严重后果的注意。蒋说:“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①并郑重表示:“万一到了最后关头,吾人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正是基于蒋介石的这种思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谈判”与“备战”并重的方针,陷入了战与和两难的境地。

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我集中部队,颇觉迟缓;战斗序列,犹未颁发;后方补给,亦未规定,前军各师,各自为政,……指挥不一,亦危道也”。^②由于最高军事当局的战略指导是应战“折冲”,故增援平津的部队都停留在保定以南的冀中、冀南地区,仿佛在坐待日军选择进攻平津的日期。此外,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派之间的隔阂根深蒂固,非嫡系部队生怕被借机消灭,各军互相猜忌,观望不动,丧失了良机。对于中央军北上,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都存“未知中央此次对日战,对各该军,是

① 《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2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陈诚致大本营对平津作战总结电文》(1937年8月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否整个或分割加入战斗序列,扣将乘机分别他调”之想。^① 所以,地处华北对日最前线的宋哲元对此深存顾虑,对归他节制的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只允许到达保定,致使增援部队与第29军相距甚远,难以呼应和协调作战。况且,由于南京政府战与和的矛盾,宋哲元对中央意图捉摸不清,生怕蒋介石借机削弱或牵制自己。因此宋哲元在接到南京政府积极备战的指示后心里并不踏实。打耶?和耶?宋哲元举棋不定,于是致电冯玉祥,“探询中央内情”。^② 对冀察当局在处理事变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三、廊坊事件

宋哲元从日本大举增兵,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动中,认清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并于22日晚与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等人的会晤中,了解了蒋介石被迫准备抗日的态度,以及蒋介石令其移驻保定的用意,遂积极筹划抗战。与此同时,蒋介石补充第29军子弹300万发,并令河南一部分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哲元指挥。

7月25日,廊坊事件爆发。廊坊位于平津之间,北宁铁路穿镇而过,扼平津间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时由第29军派第38师第113旅驻守。日本为攻陷北平,非占领这一军事要地不可。7月11日开始,日军不断到廊坊实行挑衅、侦察,为攻占廊坊找借口,作准备。25日下午4时,一列日军兵车开进廊坊站。初到站,日军声称是交通列车,修理沿途电话线。但从车上下来的却是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第11中队官兵,他们在站台上布置警戒,驱逐车站闲杂人等,并禁止站外的行人进站,实际欲将车站

① 《刘峙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7月20日),侍从室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卢沟桥事件第五十次会报记录》,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非法占领。廊坊警察分局中国驻军派代表前去交涉,然日军蓄意挑衅,除仍留主力部队隐蔽在车站内之外,又派兵出站沿廊坊周围修筑工事,遂与当地驻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被迫主动出击日军,占据有利地形,利用早已筑好的工事,给日军以猛烈的打击。日军没带重武器,加之立足未稳,又一贯轻视中国军队,仓促应战,伤亡惨重,但仍占据车站进行顽抗,等待援军。廊坊驻军决定争取主动,在拂晓前将车站内日军全部歼灭,夺回车站。但当夜12时,因接到北平方面的调解冲突的通知,只得放弃拂晓前歼敌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却增派援兵千余人,还命令驻屯军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在乘火车去北平途经廊坊时,下车参加该地战斗。26日拂晓,日军27架飞机开始在廊坊上空轮番轰炸。上午8时,日军增援部队基本到达,立即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对中国守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击。车站、营房均毁于炮火。中国守军一面作殊死抵抗,一面撤入青纱帐,至下午1时,因不敌优势的日军,忍痛退出廊坊,转至安次县城关。日军占领了廊坊,断绝了中国军队平津之间的交通,第29军陷入了更加危急、被动的局面。

四、北平失守

日本中国驻屯军所辖各部至1937年7月20日为止,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进攻部署。其军司令部驻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驻北平,下辖部队分散配置在丰台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线上。其中第1联队主力驻北平丰台与通县,一部驻天津,第2联队主力驻天津,其余分驻在塘沽、滦县、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增援华北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集结于密云,独立混成第11旅团驻扎高丽营,第20师团主力到达天津,并以一部在唐山和山海关集结。原有的驻屯旅团全部集结于北平。总兵力约30000人。

中国方面,驻平津与冀察地区的第29军,共辖步兵4个师,骑

兵1个师和1个特务旅,两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其军部驻南苑。第37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师部驻北苑;第109旅驻保定,一部驻任县;第110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第111旅驻北平城内。第3师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该师第1旅驻大名、广平、长垣地区。第143师驻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境内的平绥铁路沿线。骑兵保安部队和独立第39旅驻北平黄寺和北苑,并有一团驻北平城内。冀北保安部队和独立第39旅驻北平黄寺和北苑。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南京政府军事当局也派兵一部向保定和石家庄地区集结。在日军完成进攻部署后,第29军也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并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7月26日,攻占了廊坊的日军,继之又占领了平津间的北仓、杨村、落堡等车站,切断了天津与北平之间的交通。宋哲元得报后,立即召见外交特派员,告以“战争恐不能免”,^①急令第143师师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迅速返察,做好作战准备。

就在同一天,驻丰台日军500余人,自丰台乘卡车数十辆,开到广安门外财神庙以北集结。当晚7时许,约200名日军分乘载重汽车十数辆向广安门开来,冒充城内驻华使馆卫队野外演习归来,企图混进北平城。担任广安门城防的独立第25旅第679团刘汝珍部识破诡计,乃打开城门,诱引日军入城之后,一齐开枪射击。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损失惨重,敌首樱井德太郎负伤而逃。当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27日正午以前将卢沟桥和八宝山附近第37师撤至长辛店,并把北平城内的第37师所部全部撤出城外,然后陆续退往保定,“如果不实行,则

^① 《中国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02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认为贵军未具诚意,而不得不采取独自行动以谋应付”。^①按照日军要求,简直是要中国军队拱手让出北平。

日军不待中方答复,便于7月27日凌晨3时向通县发动总攻。双方激战至午时,中国军队寡不敌众,突围撤退。同日晨5时,日军也向团河围攻,并出动飞机18架配合作战,中国守军伤亡逾千人。至此,蒋介石和宋哲元都感到和平解决中日冲突已毫无希望。蒋电令宋部,“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②宋哲元一方面电呈南京国民政府,陈述华北局势严重;另一方面正式答复日方,拒绝一切无理要求,退回日本的最后通牒。宋哲元当日召集军政要员会议,会后发表了《决尽力自卫守土通电》,表示在“国家兴亡,千钧一发之际”,要“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③同时又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任命冯治安为城防司令,张维藩为戒严司令,秦德纯为总参议,配备了城防部队,加紧构筑临时工事,准备固守北平。宋哲元又通令29军各部奋勇抵抗,连夜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戈定远驰赴保定,指示北上的第40军向静海、独流镇集结,策应天津,第26路军进驻长辛店、良乡,以支援北平,协同作战。

可是,宋哲元对日态度的摇摆,使抗日作战丧失了最宝贵的时间,日军绝不允许第29军有喘息的机会。7月27日深夜,日军对北平南郊的南苑发起试探性进攻。28日黎明,日军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起总攻。集结于团河附近的日军第20师团主力与位于北平东南约15公里处马驹桥的华北驻屯军一部,在40架飞机的掩护下,从东、南两面同时向南苑阵地进攻,另以混成第4旅团所部

① 《日中战争史》,第337页。

② 《蒋介石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27日),侍从室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29日。

切断了南苑到北平间的公路联系,其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步兵第11旅团,由北平北侧推进,攻击北苑和西苑。日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北平四郊中国守军的工事。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第29军在敌重兵围攻下仓促应战,“因驻地分散,且中其缓兵之计,未能将兵力集中”,^①很快被日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加之防御工事简陋,尤其是南区方面,仅以营防周围障碍物作为掩体,在日军优势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很快,各部队之间的通讯失去联络,造成指挥失灵,秩序混乱,情况极其险恶。位于丰台的日军驻屯军主力,前出至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由南苑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部队。下午,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壮烈殉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撤向北平时,受到日军袭击,中弹身亡。

当南苑战斗展开之际,第29军37师一部曾向丰台之敌发动攻击,并一度收复丰台,但后又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29军在大瓦窑、大井村、小井村、五里店、卢沟桥车站等处都猛烈地反击了敌人。

28日,昌平、高丽营的日军在飞机的配合支援下,分向沙河、小汤山、北苑一带猛扑。第29军所部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仍浴血奋战,节节抵抗,临近傍晚向北城圈退却。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占清河镇,该地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至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为扭转被动局面,武清方面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向廊坊展开攻势,切断敌人后路,威胁其侧背,但很快被敌军回援部队击退,于当晚向安次撤退。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入夜以后,战况对第29军更加不

^① 《津浦路作战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利,北平南、北郊的日军俱已迫近城垣。宋哲元见大势无法挽回,乃命令北平郊外作战部队向永定河右岸退却。第29军司令部也于当晚撤至北平市内,宋哲元召开了第29军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撤离北平。晚11时,宋哲元偕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及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留下张自忠收拾残局。第37师也奉令向保定方面撤退。

29日上午,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敌战斗至中午后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4旅与敌战斗后转移到古城,战斗结束后又返回北苑。该旅于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留在北平城内的独立第27旅,被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数日后突围到察哈尔省。第29军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时,该师第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之线,掩护军部和北平部队经门关沟南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撤向保定。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南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文化古城北平完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五、天津失落

日军攻占北平,扼住了平汉、平绥铁路,然后以北平、山海关和唐山的兵力夹击驻守天津之第38师。天津形势危如累卵,十分险急。

天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平日驻有日军河边旅团步兵第2联队、独立炮兵联队及战车、骑兵、工兵、化学各一个中队,驻屯军空军大部也集中在天津。七七事变爆发以来,日军相继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驻塘沽的日军千余人占领了塘沽码头,驻天津日军则占领了天津火车总站和东站。日军大量增兵天津,除步、炮兵外,还有大批飞机,“截至27日,津市共停日机60

余架”，28日下午4时，又有日军临时航空兵团飞机“百余架抵津东局子机场”。另外，日军还不分昼夜地进行侵占天津的战术演习，从25日起，已发展到演习巷战，到27日，日租界实行戒严。

此时，驻天津的中国部队不仅同北平失去了联系，且在数量上亦处劣势。天津市内及郊区只有第38师手枪团1000余人；独立第26旅的两个团约3000人；天津保安队3个中队和武装警察约1500人，共计5500余人。天津上空密布的战云使中国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他们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于28日凌晨1时向日军发起攻击。由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仓惶应战，战役之初的几个小时，中国军队打得很顺利，相继收复了天津东站和总站、北宁铁路总局。在东局子机场和海光寺战斗中，中国军队也给予日军以严重打击。中国军队的突然进攻，完全打乱了日军的部署。日军料所不及，仓惶应战，处境极为不佳。日本驻津总领事给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的电报承认，“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极为危惧的状态”。^①

29日凌晨2时起，日军分四路出动，大举进攻天津市区。李文田与副指挥刘家湾、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发出联名通电：“自卢案发生，日本无端分别袭击平郊各处外，并于今日晨复强占我特别四分区，分别袭击各处，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② 38师及天津保安队奋勇抵抗，并对日租界实施包围，大举反攻。经反复争夺，中国军队终于攻入日租界，并从大和街、旭街、福岛街三个方面包围了日军守备部队。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日军“已完全陷入危急状态”，租界内实行非常戒严，连日本侨民也被组织成“义勇队”，准备作困兽之斗。与此同

① 天津《益世报》1937年7月29日。

② 天津《益世报》1937年7月29日。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时,中日两军在天津总站、飞机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等处激战,战斗非常激烈。

29日上午8时左右,大沽口第224团炮轰停驶于海面的日本军舰,日海军与步兵联合发动反扑,大沽口形成激战。同天,中国守军化装成保安队员进攻为日军所占据的公大第七厂,战斗从凌晨持续至下午,给日军以较大杀伤。

下午,香月清司命令第20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司令官也命令原计划向承德输送的一个支队转往天津。下午2时许,敌援军赶到,在战车、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并重点轰炸北宁路总站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金汤桥西畔的警察总部、日租界北端外的电话局、车站和万国桥之间的邮务总局以及南开大学,使总车站、南开大学校舍等处大半毁于战火。中国军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付出了惨重代价,战斗力锐减。孤立无援的天津守军在敌四面包围和空中轰炸之下,有全军覆灭之虑,急需有力部队的增援。遗憾的是南京政府却对天津抗战采取了推脱观望的态度。27日,宋哲元曾致电蒋介石要求庞炳勋军迅即集结静海、独流镇一带,以便策应天津,被蒋介石托词拒绝。29日上午,宋哲元又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再次“拟请中央速派大队增援”,^①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中国军队在血战一昼夜后,自力不支,“惟天津方面,日方又增厚兵力,且随有大批飞机飞至”。^②李文田等率驻津各部被迫于29日下午3时撤离天津,到静海县和马广两地集中。30日,在北平失守后的第二天,华

①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7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北重镇天津也沦陷了。

第三节 八一三事变与中国的军事调整

一、大山事件与双方战役部署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其中上海市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统帅部认为,占领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能使中国“军队和国民丧失战斗意志”,^①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屈膝投降。因此,日本军部在入侵华北的同时,拟在华东地区进行作战。

淞沪地区从1932年第一次淞沪战役后,事实上已成为不设防地带,上海更是一座不设防城市。按照当时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无权在安亭经太仓到长江岸边的七丫口一线(当时的停战线)以东驻兵,这样,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然而,日军在沪兵力却有驻上海日本海军第3舰队及其所属陆战队3000余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驻上海日本海军第3舰司令官长谷川清于8月4日要求军令部秘密陆续向上海派遣特别海军陆战队。军令部的答复是:“要慎重,待继续观察形势再作考虑”。8月7日上午,日本海相米内提出为了保护青岛和上海的侨民,应准备紧急派遣陆军兵力的议案,并将此案交陆相杉山,建议内阁审议。可这一议案未得到内阁讨论而搁置起来。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8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与此同时,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方面为应付突发事变,已于7月8日正式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指挥第87师(驻常熟、苏州)、第88师(驻锡、澄)及江苏、上海保安队数团,在淞沪地区对日戒备。不久,又增调第2师补充旅开往苏州归张指挥。张治中即令该旅1个团化装为保安队进驻虹桥和龙华飞机场警戒;另以1个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松江。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先发制敌”的建议,可得到的答复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①双方在淞沪地区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中国方面对于作战的准备较日方更为积极充分。8月1日张治中发表文告,鼓励所属官兵:“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同日,张发表《告京沪区民众书》,呼吁“惟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②

8月9日下午5时左右,日军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等两人乘摩托车越入中国保安队警戒线,向虹桥机场方向疾驰,不仅不听中国方面的停车命令,反向我守兵开枪,中国保安队员被迫还击,将两人击毙。这就是所谓“虹桥机场事件”,即大山事件。大山事件的发生使上海的形势顿时紧张。上海市长俞鸿钧闻讯后即向日方领事提出交涉,谋求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防事态扩大。但驻沪日军却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方面提出苛刻条件:(1)撤退市内保安队;(2)所有保安队防御工事应拆除。^③并以武力解决相威胁。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长谷川清下令在佐世保待命的机动部队迅速向上海增

①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9页。

③ 《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8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侨义勇团备战,将日舰30余艘集中吴淞一带,随时准备采取行动,陆军亦开始向上海调动,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中国政府已意识到日军制造虹桥机场事件是大规模进攻上海的征兆,上海战事已不可避免,遂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在事变刚发生时即令“第87、88两师,做输送前进的准备”。^①8月11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决定围攻上海,密令张治中率领所部第5军第87、88两师于当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推进,准备对淞沪发动攻击,并急令该军在西安的第36师火速南返,参加上海保卫战。同时令在蚌埠的第56师,在嘉兴的炮2旅炮兵1团,在华北的炮团之一营“星夜开赴苏州归张治中指挥”。^②是日夜半张治中离开苏州,统率全军从苏州、常熟、无锡一带,利用事先控制了火车和汽车向上海挺进,12日晨,进驻上海。张治中以第87师的一部进至吴淞,控制罗店、浏河,主力前进至市中心区,第88师前进至上海火车北站与江湾间,炮兵第10团第1营及炮兵第8团进至真如、大场,独立第20旅在松江的一个团进至南翔;令炮兵第3团第2营及第56师之一部自南京、嘉兴各地兼程向上海输送;派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第56师及江苏保安第2、4两团,负责东自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③至是日黄昏前,中国军队的战役部署基本就绪。原在上海的地方部队主力于真如、闸北和江湾市中心区、吴淞各要点布防,一部警戒沪西沪南,掩护我军前进。中国军队进入了上海及其附近预定阵地。

①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9页。

② 《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8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6页。

③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20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张治中在所部完成对上海日军进攻的部署后,决定先发制敌,准备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开始对虹口和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进攻,以在日军援军和日军对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图琢磨不定时,乘其措手不及,“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然因接获南京方面“不得进攻”^①电令而未能行动。致使军事计划耽搁,给了日军从容部署的机会,中国军队痛失进攻良机。

日军方面,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一方面向中国方面提出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命令在日本佐世保待机的海军一部进入上海。在日本国内,海军中央部研究了这一事件后,要求第3舰队“慎重行事”。10日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表示尚待判明真相,并希望派遣陆军部队。12日,日本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达成陆海军共同作战的决定。13日上午9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作出了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的决定。

中日双方的战役部署表明,上海战事虽已不可避免,但这时双方的战略重点都置于华北方面,所以双方投入的兵力是有限的。中国方面在平津陷落后,军事当局认定日军向上海进攻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乘日军的注意力还放在华北而尚未动员国内兵力发动对上海进攻之前,采取主动行动,首先消灭驻沪日军,然后抵抗和消灭登陆之敌较为有利。因此,中国方面对于作战的准备较日方更为积极充分,中国军队决定采取“先发制敌”的方针,主动向驻沪日军发动攻击。

二、中国战时机构的建立与自卫抗战声明

面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可能性,为尽快建立战时政府来统制经济、发布命令和征用兵力,使战时经济军事措施得以推行,中国政

^①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20页。

府开始向战时政府过渡。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在南京举行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中国实施全面抗战”。^①并决定中国抗日战争“取持久消耗战略”。^②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成员包括“中枢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员”。职掌“(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拥有极大权限,可以对党政军一切事项“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赋予了蒋介石以战时的绝对统帅权。^③

为确立战时政府的形式和运行程序,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52次会议在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召开。会议认为在没有对日宣战的情况下,不宜设置大本营。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任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委会下增设秘书厅,张群为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设立军令、军政、财政、经济、宣传、组训6个部,分掌有关事宜。14日,国防最高会议举行第1次会议,决议设立国防参议会为国防咨询建议机关,同国防最高会议一起共同负责筹划抗战国策。^④同时,为了加强具体的军事指挥,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①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第84~8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刊行,1989年3月版。

②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83页。

③ 马超华:《中国国民党如何领导八年抗战》,载《近代中国》第47期,第10页。

④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中国战时机构的建立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性抗战作了组织和战略准备,使中国能够在日本的进攻面前从容组织抗战和实施抗战方略。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小分队向上海江湾八字桥中国守军87师阵地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

在中国军队英勇作战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受权代表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虽然仍然希望事态不扩大,但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并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则当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行动。如是则中国乃当其和平意志,以期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吾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① 显示了中国在日本步步侵略面前,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准备全力进行抗战。

三、中国军队主动进攻与封江战役

中国军队挫败了日军的挑衅后,国民政府也向全国人民和世界昭示了其抗战决心,以图趁日方援兵未到之机,一举歼灭在沪日军,然后再与求援之敌决战。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第2分册,第11页。

8月13日夜,蒋介石下令警备军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为总司令,并于“14日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苏浙边区军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为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汇山码头及公大纱厂;空军于14日出动,协同陆军作战,并任要地防空。14日下午3时,张治中下达总攻击命令,出动炮兵和步兵向日军阵地进攻,实施攻击。中国空军也出动3架飞机对虹口及汇山码头等处日军据点进行轰炸。随后第87、第88两师并列,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进攻,战斗至日暮,中国军队夺回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等地。傍晚,张治中接到蒋介石命令:“今晚不得进攻,另候后命。”^①此后两日中国军队继续攻击,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及日海军俱乐部各点克复。当时日机限于航程,未对中国军队形成很大空中威胁,中国空军在连日空战中取得击落日机42架的辉煌战绩。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第36师或钟松旅加入第87师方面,预定明日(17日)拂晓全线总攻击,一鼓歼灭敌军,占领虹口为要。^②中国军队再次对杨树浦方面之敌发起进攻,第87师攻占了日海军俱乐部,第88师冲入日军坟山阵地。但日军工事坚固,中国军队的炮火无法将其摧毁,且中国军队攻击的重点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军防御的核心阵地,故虽付出重大代价仍未能攻克。19日再攻,“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③至下午5时,王敬久第87师前锋部队突入至杨

① 张治中:《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序幕》,见《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170页。

③ 《张治中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张治中令所部扩大战果,调整部署突入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敌人。至20日拂晓前,中国军队的进展,西至欧嘉路,东至大连湾路,南至昆明路、唐山路。日军组织兵力从昆明路方面多次反攻,都被中国军队击退。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计划,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京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9月17日以后由蒋介石自兼),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陈诚任前敌总指挥。同时制定了作战方针:“国军一部集华北持久抗战,特别注意确保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①第3战区将全部兵力(共19个师又16个旅)划分为淞沪围攻军,指挥官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长江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54军军长崔揆章;长江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11师师长常恩多;杭州湾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浙东军备区指挥官为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同日凌晨,中国方面第36师第106旅由杨树浦区北缘开始前进,天明时进抵沙泾港、梧州路、昆明路之线,左与大连路之第87师右翼连接。淞沪围攻军再次对敌发起总攻,并将攻击重点由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改为汇山码头,拟将日军截为两段,再分别围歼之。经一夜激战,第36师突破日军阵地进抵百老汇路,22日晚上又一度进至汇山码头,但遭到日海军炮火的阻击,又因进展过快,对巷战地区搜索不严,以致日军便衣队与汉奸乘机纵火扰乱。我攻击部队前后隔绝,同日军形成混战,伤亡惨重,官兵死伤达二千名,被迫撤回唐山路原守阵地。

^① 《抗日御侮》第5卷,第14页。

23日凌晨,为阻止日军沿江西犯,免使中国军队遭受腹背夹攻的威胁,蒋介石下令采取封江措施。早在淞沪大战前夕,蒋介石下令致电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俞飞鹏,要求“凡招商局之江船,平时应多留航于汉口与南京、镇江间,勿使其多留上海为要,又废还大小船只,不论几何,应令全入江内候令”。^① 8月11日夜,蒋介石在下令张治中向上海预定围攻线开进的同时,命令海军阻塞江阴水道,同时命令第39军刘和鼎辖驻蚌埠之第56师及江苏保安第2、第4两团,任东自宝山、西至江阴刘海沙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是日深夜,中国海军部长陈绍宽率舰队至江阴,指挥“甘露”、“青天”等3艘测量舰和两艘炮舰将长江江阴下游的航行标志如灯标、灯船、灯塔等一律拆毁,并将港道阻塞,阻止日舰冲入。8月12日,江阴江面阻塞工作初步完成,事先抽调海军舰龄较长的“通济”、“自强”号等8艘舰艇及向国营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集“通济”、“华富”号等20艘轮船一共28艘凿沉堵塞江面;不久又征用3艘商轮和抽调“海容”号等军舰沉塞。这样前后共凿沉大小军舰、商轮35艘,合计吨数6万8百余吨。^② 随后为加强阻塞效果,又将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各地的趸船计8艘拖往江阴江面下沉,并由苏、浙、皖等地征用石子2354英吨、大小民船和盐船共185艘陆续沉塞,“以弥补罅隙”;同时中国军队又在江阴一带江面密布水雷,并派海军第1舰队“平海”、“宁海”、“应瑞”、“逸仙”号主力战舰泊守江阴,严阵以待。中国军队在长江江阴段构筑了坚固的封锁线。

8月14日,沪战正酣,中国海军为严防日军溯黄浦江上犯,抄

① 《蒋介石致俞飞鹏手令》(1937年8月4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

② 《海军抗战纪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55页。

我陆军后路,遂将“普安”号运输舰沉塞浦江董家渡水道。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的敌舰,绝对防止日舰通过江阴以西为主要目标,派出一部协同沿江各要塞及陆地部队的作战”。^① 8月16日,中国电雷学校教育长欧阳格从江阴率鱼雷艇到上海,派大队副安奋邦率第105号艇艇长和士兵5人冒险开到南京路的外滩附近,向停泊日本领事馆码头附近的日本“出云”号旗舰连续发射鱼雷,将其击伤。至17日,中国海军完成了浦东区的三道江面阻塞工事,“分别敷布水雷外,又因上海港汊纷歧,另用中、小型水雷于作战陆军各部队防区择要敷设,并担任破坏桥梁、供给陆军地雷等工作”,^② 阻止日军从水上登陆,威胁上海市区。

面对中国海军坚固的江面封锁,日军军舰无计可施,于是从8月16日起,出动大批飞机空袭泊守江面的中国军舰,企图冲破江阴封锁线。中国海军英勇作战,以舰队高射炮构成强大的防空网,击退日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与日机周旋了30多天。8月22日,“宁海”舰击落日机一架。9月22日,日军出动大队飞机集中围攻中国军舰,中国海军各舰官兵浴血奋战,历时6小时,日机不支遁去,共有5架受伤,我海军“平海”、“应瑞”两舰受伤,“平海”舰舰长官宪申,高射炮指挥见习生孟汉霖、高昌衢等壮烈殉国。23日,日军又出动六七十架飞机分批向中国军舰围攻,尤以“平海”、“宁海”为其轰炸目标,中日海、空军再度展开猛烈的海、空战,终因敌机麇集,寡不敌众,平、宁两舰先后被炸沉,中国海军官兵伤亡惨重,但日军也付出4架飞机被击落、2架飞机受伤的代价。^③ 25日,日军

① 国民政府大本营训令第一号《战争指导方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海军抗战纪事》,第55页。

③ 《海军抗战纪事》,第56页。

飞机再次来犯,16架飞机轮番轰炸江阴附近的中国海军第1舰队“逸仙”号舰,第1舰队司令陈季良率领全舰官兵沉着应战,“击落敌机两架沉没江中”。^①“逸仙”号军舰也因被炸进水,被迫搁浅。中国海军赶派“建康”等舰驰往救护,并令第2舰队司令曾以鼎率“楚有”舰赴江阴接防。“建康”号在救援途中遭日机前后夹击轰炸,舰中8弹,舰长齐粹英、副舰长严又彬均被炸成重伤,全舰付出了伤亡34人的代价,舰也因进水过多,沉没江底。10月,中国海军第2舰队移驻江防总部,继续负责江防要塞事宜。日军不断出动强大机群进行空袭,至10月8日,中国海军又有8艘军舰弹竭船损,沉没江中。

与此同时,从8月20日起,日军连续出动飞机轰炸淞沪海军各机关,海军司令部、江南造船所、吴淞海岸巡防处等先后被炸毁,中国海军“永健”号亦“屡遭空袭,迭次抗战,相持数日,终于25日被炸沉”。^②中国海军一面在浦江布设水雷,一面寻机炸毁日舰及其重要军事建筑。9月8日,我海军炸毁日海军在浦东新三井的第3、第4两号码头及趸船,并炸沉日海军汽油艇两艘。9月29日晨,中国海军再次谋炸日海军“出云”号旗舰,“亦几命中,该舰左右之防御物均被炸毁,舰体受震损伤”。^③中国海军同浦东刘和鼎江防部队一起,组织炮队,扼守要隘,以严防日军溯黄浦江上犯,包抄淞沪陆军后路。

从10月29日起,中国海军奉令退守长江两岸,拆下舰载重炮;组织炮队,分别配置于江阴、浦东及太湖各处,随时准备“候敌来犯,予以痛击”。

① 《海军抗战纪事》,第56页。

② 《海军抗战纪事》,第54页。

③ 《海军抗战纪事》,第54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中国海军的封江战役,打破了日本海军深入长江,准备南进和包抄淞沪陆军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的作战。

四、工厂和文化教育的内迁

淞沪抗战的爆发,使战火迅速扩大,集中于沿海、沿江大中城市及华北、东南一些较为发达地区的工厂有毁于战火或沦入日本人之手的危险。国民政府为保障支撑抗战所需工业物资的供应不致中断,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一批重要的官办工矿企业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内地。一些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不甘沦为亡国奴,更不愿工厂落入敌伪之手,纷纷要求政府资助迁移到内地各省。同时,为保存中国的学术文化,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文化和教育机构也陆续内迁,形成了抗战初期蔚为壮观的工厂内迁和高校、学术文化机关内迁运动。

工厂内迁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即有筹划。1937年7月22日,资源委员会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规定总动员具体事项有粮食、资源和交通统制,民众组织与训练,各地卫生机关及人员材料之统制和金融财政之筹划。其中资源统制指定由资源委员会、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会同筹办,由资源委员会召集,负责具体实施。28日,资源委员会机器、化学组召集会议,建议“迅速迁移机器及化学工厂,以应兵工需要,并派员先行接洽”。^①8月6日,资源委员会机器化学组召开会议,议定机器厂内迁具体办法,其他如橡胶和食品等行业的工厂也被同意一并迁往内地。8月9日,资源委员会根据派出人员与上海工业界人士商洽结果,拟定迁移工厂提案,致函行政院,请求政府补助工厂迁移费用和奖励工厂内

^① 《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1),见《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迁,并由政府出面商请银行低利息借贷给工厂、拨给地亩额等,行政院于次日第324次会议议决:“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厂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①当日,由资源委员会及相关机关联合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成立,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任主任委员,并当夜赴沪监督迁移。

8月11日,由各厂方代表组织的上海工厂迁移联合委员会成立,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之下进行工作,颜耀秋为主任,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下进行工作。“迁委会”决定各厂在武昌徐家棚附近集中,再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南下岳阳、长沙,同时由资源委员会派委员王宠佑在武汉主持划地及与银行接洽事宜,迁委会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协助进行。迁委会并分别在镇江、苏州设分站,协助转运工作。至此,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工作正式开始。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一部分工厂的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另一部分靠近租界的工厂,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迁运的路线为用木船沿苏州河将机件运至松江,抵苏州后雇小火车装运至镇江,再移装民生公司江轮直驶汉口。至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松江河道告警,于是内迁物资改由怡和轮船运南通,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12日,上海沦陷。上海工厂内迁运动至此结束。这次工厂内迁,除去公营和国营的工厂外,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材料抵汉口者为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名。^②这对于拥有1186家民营工厂

① 《上海迁移工厂案节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1942年自印稿第14~15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的上海来说,迁出工厂只为极少数,大量工厂沦于敌后,成为中国战时工业的一大损失。

随后,11月14日,全国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负责战区厂矿的内迁工作。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颁布《工厂迁移协助方法》,将迁移范围扩至普通厂矿,全国规模的厂矿西迁运动由此开始。至1938年2月底,由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山西、江西等省内迁至武汉的厂矿达137家,机料25728.2吨,技工2375人。

由于国民政府长期对日本存在幻想,对高校内迁未予重视,除南开大学与北洋大学曾自发到重庆与西安准备筹建分校外,其他所有高校都毫无动作。因此,当战火蔓延后,东南沿海各高校很快都遭到日军的践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南开大学的校园被日军狂轰滥炸,几乎夷为平地;上海光华大学的全部建筑物被毁于八一三战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据1939年的统计,战前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因战争迁后方者有52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暂时续办的有25所,停办的有17所,其余14所或是原设后方,或是教会大学能在沦陷区勉强维持的。^①

抗战期间各国立图书馆与博物院的书籍文物以及工作人员的内迁则筹划较早。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抗战初起时即奉令迁川,初在重庆设办事处,继迁白沙,最后迁重庆正式成立。在战时除保存原有图书外,并派人到上海秘密收购各种孤本秘籍,运馆收藏。或择要影印为丛书以广为流传。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战争未起以前,已将所存善本图书移存美国与香港。北平沦陷前该馆迁移,设办

^① 吴俊升:《战时中国教育》,载《八年对日抗战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78年版。

事处于长沙,继迁昆明。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重要收藏品于战争爆发前后分批迁移后方,妥为保全,未受日军损害。重要文物于1933年已先移至上海,继迁南京,成立南京分院。七七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再从存在京沪的文物中选一批送到后方去,其中重要珍品共80箱,于八一三事变次日在南京装船运往长沙,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不久,长沙已有空袭警报,再将这批文物运贵阳。至1938年11月,从贵阳城内的一个花园移到贵州省安顺县的华严洞内,至抗战胜利后才运回南京。同时,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人员将其他全部文物连同内政部所藏古物,分从鄂、陕、辗转运输抵达重庆,并在重庆设立该院办事处,将各库宝物分散各安全地区,设立临时办事处典守保管。因此,上述两院一馆所藏中国文物精华,因战时有妥善之迁移与保全计划,幸免于日军的攫取与毁坏而能安然存在,避免了一场文化浩劫。

战时工厂与文化教育的内迁运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它昭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为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和战时教育文化的维持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日军增援与沿江争夺战

8月21日,日军调集舰只约30艘在吴淞、川沙、浏河一带炮击江岸,其援军将在各该地登陆的企图已极为明朗。第3战区决定将长江南岸守备区编为第15集团军,陈诚任总司令,辖第18军、第39军、第74军、第6师、炮兵第16团。与第9集团军的作战分界线为南翔—蕴藻浜—吴淞镇南端一线,准备攻击吴淞以西登陆之敌。

日本上海派遣军于8月22日乘船到达舟山群岛以北海面,当天午夜时抵川沙河口。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与海军协同,以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有力兵团在川沙镇方面,以主力在吴淞附近登陆”,^①企图于登陆成功之后迅速占领罗店镇,尔后直指嘉定、南翔,控制京沪铁路,攻击淞沪地区中国军队侧背。

23日凌晨,日军增援部队第3师团、第11师团以及第1、第8师团各一旅团在吴淞、狮子林、川沙口等处陆续登陆,并即向中国军队左翼军方面宝山、罗店、浏河一线进攻,同时对中国军队右翼军方面的川沙及浦东各地,也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一部在殷行至张华浜之间登陆,对淞沪围攻军侧翼造成威胁。当时中国第15军各部除第56师以外,均未到达指定位置。川沙口仅有第56师一个连,抵挡不住强敌,日军当天进占川沙镇,并以主力进攻罗店。吴淞方面日军2000余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登陆,守备该处之保安团势单力薄,亦无法阻敌。张华浜地区,日军第3师团1000余人登陆后,中国守军市警察总队竭力抵抗。天明后,日军出动飞机10余架,海军军舰10余艘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猛烈轰击,中国守军被迫后退。张治中得悉情况后,除命市区各部固守阵地外,急令“教导总队第2团阻击张华浜之敌,第78师调一个旅支援吴淞,并抽出第98师向宝山、杨行、罗店前进,由该师师长夏楚中指挥该师及第11师阻击登陆之敌”。^②当天下午,第11师不顾敌机轰炸进至罗店西南,立即对占领罗店之日军一部展开攻击,毙敌百余,收复罗店。

24日,日军后续部队登陆,一部占据吴淞炮台,主力向狮子林前进。在这之前,22日,陈诚作出部署,令右翼军第18军军长罗卓英辖第11、第67、第98师、炮兵第16团,攻击宝山城、狮子林、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2页。

② 《张治中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川沙口一带登陆之敌,压迫于长江而歼灭之,第39军刘和鼎军所辖第14师、第56师协同右翼军之攻击,并继任浏河至江阴间的江防。24日,这些部队先后到沪,陈诚又令:“第98师攻击杨行、宝山线(含)以左地区之敌;第11师攻击新镇、月浦、狮子林线(含)以左地区之敌;第67师为预备队,并以有力之一部由罗店、聚源行、朝王庙以左地区配合第11师进攻。”^①第98师鉴于日军正加紧进攻吴淞、宝山两地,敌若得手既可南攻上海市,又可西取罗店,对中国军队威胁甚大,遂向这两处日军展开进攻,与吴淞镇守军配合,至傍晚将敌压到江边,歼敌三百余,解了吴淞镇之围。同时另一部由八字桥向宝山城立足未稳之敌300余人急袭,激战一小时收复宝山,日军残部向狮子林退逃。第11师于23日由刘家行向罗店急往驰援,25日拂晓到达罗店外围月浦、周宅之线,在西钱桥、顾宅、新镇一带同日军展开遭遇战。接替该师罗店防务的第67师,亦向罗店以北日军发动猛烈攻击,但由于日军构筑工事速度很快,炮火猛烈并有飞机支援,致使该师陷于困境。午后,日军进逼罗嘉公路,第199旅与敌反复肉搏,双方伤亡惨重,对峙于罗店以北。

张华浜地区,桂永清教导总队虽英勇阻击,但未奏效。27日晨,日军数百人在舰炮支援下登陆,攻入殷行镇。后第36、第87两师抽调4个团兵力,几经攻击,方将敌赶回张华浜,张华浜方面成对峙状态。杨树浦、虹口正面突入日军阵地之部队于24日晚撤回,沿租界各路口固守。25日,夏楚中第98师向宝山、狮子林发起攻击,击退了狮子林的日军。26日,夏楚中以第588团第3营守卫宝山城,第二营一个连守卫狮子林炮台,该师主力在沿江宝

^①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山、狮子林至江内腹地月浦中间地带构造工事。入夜,又以一团接替第 11 师罗店以东新镇、顾家角阵地。

第 15 集团军于 27 日晚再由月浦镇、新镇、罗店、蒲家庙之线攻击日军。罗店正面日军为第 11 师团主力,敌以飞机 6 架、大炮 10 余门对中国军队猛烈轰炸,步兵千余人分路向中方阵地猛扑。激战至次日中午,在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击下,中国军队虽数次增援并发起反攻,但日军终于突入罗店。守军在熊熊烈火之中与敌展开激烈巷战,由于伤亡惨重,罗店再度陷入敌手。中国军队决意夺回罗店,第 18 军军长罗卓英下午 5 时下令向罗店包围。中日两军在罗店附近展开了空前激战。29 日拂晓,中国军队第 98 师、第 67 师、第 11 师、第 14 师分别以主力向罗店四周发起攻击。日军凭借飞机和炮火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并组织反扑。中国军队因各部苦战竟日,减员严重,十分疲惫,攻击未能奏效,伤亡惨重。鉴于日军援军陆续支援,第 15 集团军为避免更大牺牲,30 日,将围攻罗店之敌的部队撤至罗店外围宝山、狮子林、新镇、顾家角、南北塘口、西苏塘、金村、金家宅、袁家宅、杜宅南北和周宅一线防御。

日军攻占罗店后,松井石根遂命第 11 师团一部协助第 3 师团迅速攻占吴淞镇。31 日,日军第 3 师团第 68 联队在海空火力支援下,从吴淞登陆,中国该处守军第 61 师一个团在敌强大火力袭击下伤亡惨重,吴淞镇失守。同时,日军舰 20 余艘、飞机 10 余架,对狮子林炮台进行轰击,使守军蒙受重大损失。次日,敌步兵千余登陆围攻炮台,第 98 师一部与敌反复白刃格斗达 4 小时,终于全部捐躯。9 月 2 日、3 日两天,日军在海、陆炮火掩护下继续向杨家桥、月浦之间阵地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屡挫敌锋。日军见不能得手,遂将主力移至江边,在海军炮火支援下集中攻中国军队右翼,激战多时,中方因伤亡严重,渐呈不支,4 日黄昏被迫转移到顾家宅、周家宅、杨家桥一线。

由青岛调整来增援上海的日军第 11 师团天谷支队,9 月 2 日奉命沿吴淞一月浦一罗店公路攻击罗店方面中国军队之侧后。敌以 30 余辆战车为前导,从军工路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后继续向西进犯,5 日与进攻月浦的日军会合。中国军队被迫撤守月浦东侧阵地,致使守卫宝山城之第 98 师第 583 团第 3 营陷入重围。日军舰炮、飞机猛烈轰炸,并以战车攻击,守军在营长姚子青带领下,沉着应战,当晚,姚营长致电师部:“誓本与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① 敌久攻不下,6 日,向城内发射大量硫磺弹,全城房屋尽被大火烧毁,姚营身处危城之中犹尽力奋战。敌用重炮轰毁城墙,姚子青营长带领余部与敌激烈巷战,直至全营壮烈牺牲,宝山城陷落。

狮子林、福山城敌我血战的同时,为收复罗店,中国军队反复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虽伤亡甚重,但凭藉舰炮、飞机及各种轻重火器顽抗,使中国军队攻击未能成功。6 日傍晚,陈诚集团军再攻,至 7 日凌晨,第 14、11 师已将罗店包围,但此时天色渐明,日军得以集中火力猛烈轰击,福山之敌又向月浦进犯,第 14 师侧后受到威胁,只得放弃进攻,撤至月浦以东。

9 日起,日陆海空军联合向月浦进犯,中方第 98 师、第 1 师奉命固守,与日军血战数昼夜,双方付出惨重代价。至 12 日,第 15 集团军各部奉命撤至杨家宅、紫藤树下、永安桥、张家宅、陆福桥一线。

8 月 27 日第 9 集团军调整部署:右翼军孙元良第 88 师,位于北站至沙泾港间原阵地,围攻虹口敌军,并以一部任沪西一带及潭子湾、北站间警戒;中央军宋希濂第 365 师,位于沙泾港东岸、唐山

^① 《姚子青致第 98 师师长夏楚中电》(1937 年 9 月 5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路、华德路、引翔港镇北端至虬江口一线，围攻杨树浦之敌；左翼军王敬久第87师固守吴淞并围攻张华浜方面之敌，另以一部任虬江口至张华浜间警戒。^①

9月1日至5日，第9集团军辖区战况较为沉寂。6日晨，日军以海军火力支援在虬江码头登陆，第9集团军以左翼军预备队第57师加入战斗，将登陆之敌包围于码头栈房之内。7日，张华浜日军渡河向第87师南泗塘阵地发动猛攻，经守军坚决反击，激战终日，将渡河之敌大部歼灭。同日，虬江码头之敌沿军工路进攻，企图与张华浜之兵会合，遭中国军队阻击，未能得逞。日军不断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并猛烈炮轰上海市区，中国守军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阵地战，双方呈胶着状态。至11日，杨家行阵地被突破，市中心区直接与日军形成对峙。12日，因左翼第15集团军被迫后撤，第9集团军侧后受到蕴藻浜北岸日军的威胁，被迫将主力移进至八字桥、江湾、庙行、蕴藻浜南岸一线，同日军呈对峙状态。

至9月中旬，日军以两个师团的兵力同中国军队激战，进展不大，敌我双方在海岸沿线胶着，呈犬牙交错状态。17日，中国军队全线撤守北站、江湾、庙行、朝王庙、罗店西南至双草墩之间，与敌对峙。^②

六、日军反攻和杭州湾登陆

中国军队经过对沿江登陆日军的英勇抗击，终因损失过大，被

① 《张治中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迫转入防御。9月2日,第3战区发布第二期作战计划,“战区以持久抗战之目的,限制登陆之敌发展,力求收各个击破之效。各个击破不能达成时,则依状况逐次后退于敌舰射程外之既设阵地,施行韧强抵抗,待后方部队到达,再行决战而收最后胜利”。^① 决定以陈诚集团军为江岸防守军,张治中集团军为上海围攻军,张发奎集团军为浦东防守军,担任淞沪战场作战。至同月中旬,中国军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淞沪战役的兵力部署,到达淞沪前线的部队达50个师和5个炮兵团。但由于此时战局对中国军队不利,南京国民政府已面临日军占领上海,进窥南京,夺取京沪杭地区的严重危局,于是为挽回战局,乃决心大规模增兵淞沪战场。同时,从9月13日起,国际联盟召开全会,10月6日通过咨委会第二报告书,宣称日本为侵略国;并决定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国家会议。国际上的动向,使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干涉”的期望为之上升,从而也促成了蒋介石加强淞沪战场、守住上海的决心,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重建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9月21日起由蒋介石自兼总司令,以顾祝同为副总司令。10月初开始,陆续调集部队增援淞沪战场,使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达28个军又8个师、4个独立旅,共约73个师,70余万人。中央军嫡系军队参战的占其总数3/5。蒋介石以全国总兵力的1/3多的部队投入淞沪战场。9、10月份的会战是规模巨大的,空前激烈的,极其悲壮的,达到了淞沪会战的最高潮。

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以10月底为期,在华北、上海两个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日本除增派了3个师团多的兵力外,又将华北方面的2个师团大部、东北方面的1个师、国内新动员的1个师团,联合组成

^① 《抗日御侮》第5卷,第16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第10军,转用于淞沪战场;还将华北方面的一个师团调归日本上海派遣军指挥。于是,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增加到9个多师团,10月上旬其总兵力约为20万人,而华北方面的兵力则下降为7个多师团。这样,日军“将主作战转移到华中”。^①

9月13日,日军重藤支队、第101师团、第9师团先后到达。上海派遣军决定以第3、第11及第101共3个师团进攻中国军队南翔至大场一线阵地,并以重藤支队协同第1师团攻击罗店附近中国守军。14日起,敌军在飞机、战车和火炮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发起全线进攻,重点指向宝罗公路东南方。第15集团军各师与敌在潘泾河附近淑里桥一带激战,双方损失惨重,“每日数千”。^②17日,第18军撤至杨家宅、陆福桥、施相公庙一线,终于制止了日军攻势。敌见消灭中国军队之企图不能实现,乃改向西方进攻,企图压迫中国军队后退。

中国军队于21日调整部署,第3战区分为右、中、左3个作战军。右冀作战军司令官张发奎,辖第8、第10集团军;中央作战军司令官朱绍良,辖第9集团军及第18、第61师,独立第21旅;左冀作战司令官陈诚,辖第15集团军及新编成的薛岳第19集团军,分别担任浦东地区、闸北地区和罗店西南地区的防守。

从23日拂晓起,日军约两个联队对第66军陆福桥至杨家桥间阵地发起进攻,不断以重炮猛烈袭击,并以战车掩护步兵冲锋。中国军队与敌反复肉搏,阵地失而复得者多次,双方伤亡惨重。次日,中国军队左冀作战军调整阵线,以江家屯、窦家弄、孟湾、顾家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上册,第374~375页,中文摘译本。

②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第113页,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78年版。

镇、北店宅、太平桥、周家牌楼、万桥、罗店南端经施相公庙、朝王庙至浏河为主阵地；以江家屯沿蕴藻浜至陈家行，沿杨泾河、广福、孙家宅至施相公庙为二线阵地。25日，日军以2个师团的兵力继续猛攻，30日拂晓进抵陆宅。该处第67师一个连苦战数昼夜，与敌展开白刃肉搏，前仆后继，最后仅2人生还。同时由于第77师万桥阵地被敌突破，左冀军各部撤往蕴藻浜南岸之原定二线阵地。

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进一步明确“军事行动之目的，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应采取适当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认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罗店西南战事呈胶着状态，从侧翼包围中国军队的企图无法实现，决定改为中央突破。计划于攻陷大场后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以北之华军，然后向南翔进攻。^①

5月起，日军第9师团和新到达之第13师团向蕴藻浜地区发动猛攻，中日双方激战四昼夜，都遭受重大伤亡。中国方面第77、59、90、67师及第66军教导旅不得不撤至后方整补，由后续部队接防。8日，敌强渡蕴藻浜，第8、61师及税警总团等部与敌激战数日，损失惨重，未能将渡河之敌歼灭，以致日军于黑大黄宅至东西赵家角一线构成宽约二里之桥头堡阵地，掩护其后续部队南渡，并进犯大场。

由于大场形势关系全局，第3战区急令新到之廖磊第21集团军向该方面增援，并于15日调整部署，将蕴藻浜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负责。为恢复蕴藻浜南岸阵地，战区决定对敌实施反击。“以新到之韦云淞第48军为一路攻击军，由黄港、北侯宅、谈家头附近向蕴藻浜南岸之敌发起进攻，进出唐桥站、田都之线；以叶肇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56、79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第66军为二路攻击军,由赵宅附近向东进攻,进出杨家宅、徐家宅一线;以第98师为三路攻击军,由广福南侧向孙家头、张宅一线进攻;原守备各师编为一至三个突击队向当面之敌进攻,协助各路攻击军前进”。^①20日,第66军克服敌之顽强阻击,收复三新宅、唐桥头,但第21集团军当面为日军主力,虽付出重大代价仍未获进展,左冀第15集团军也未得手。21日,全线停止进攻转为防御。

22日、23日两日,敌以主力向第21集团军猛攻,北侯宅、沈宅、谈家头一线阵地被突破,第21集团军不得不撤至小顾住宅、大场、走马塘、新泾桥、唐家桥一线。第9集团军左冀各师也随后撤至大场附近。24日,日军乘胜进犯大场。在敌强大陆、空火力打击下,朱耀华第18师“苦战竟日,至25日阵地大部被毁,遂被突破”。大场失守。至此,中央作战军四面受敌,退路有被切断之危险,遂于26日放弃北站至江湾间阵地,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一线转进。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第88师第524团一营官兵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坚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奋战阻敌前进,给日军以重大杀伤。

由于中央作战军正面缩小,第3战区决定将其撤销。战区正面分左右两路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张发奎指挥。

31日起,日军在周家桥、姚家宅、姜家宅等处强渡苏州河。日军第3师团左冀一部刚渡过河,便因遭到守军阻击受挫;该师团右冀部队则于11月5日强渡成功。日军第9师团11月1日渡河后,中国军队从苏州河北岸南翔方面调来部队进行反击,曾使敌军

^①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一度陷入困境。“虽未悉数歼灭,但至11月8日敌未扩大其过河点”。^①但日军第11师团攻占了南翔附近之江桥镇,威胁中国军队侧后,解除了其第9师团的压力。9日,中国军队全线后退。日军第3、第9师团是日傍晚进抵龙华、高家湾,完成了对上海南市的封锁,中国留在南市及浦东地区之保安队等2000余人,继续坚持与敌作战数日,方停止有组织之抵抗。

至此,淞沪抗战从8月至10月已延续两个月,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虽然投入9个多师团的兵力,且在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仍不能达到目的。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这对其速战速决战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军参谋本部为迅速解决上海战争,10月20日下令:增派第10军及必要兵力,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于上海派遣军完成任务;上海派遣军执行现任务,同时协助第10军登陆。^②

日军选定的登陆地点,是位于上海南方的杭州湾北岸之金山卫和全公亭。这里海岸线平直,近岸有40尺以上的水深,且接近苏州河中国军队的侧背,是淞沪地区最良好的登陆场所。日军登陆后如占领松江,即可切断沪杭铁路,与北面的上海派遣军配合,对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形成包围。淞沪抗战初期,中国方面为防止日军增援部队在沿江沿海登陆,曾设置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第8集团军4个师又1个旅担任防守。后因上海方面战事紧张,第55、57、62师及独立第45旅先后被调往浦东一带协助正面作战,以致从全公亭到乍浦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仅有第62师之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担任守卫。这是中国军事当局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①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8~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87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11月5日拂晓,日军先以舰炮对金山卫附近中国军队阵地轰击数小时,然后步兵在飞机掩护下,于全公亭、金比娘桥、金山卫、金山嘴、漕泾等处同时登陆。中国以两个连兵力对日军3个师团之众,力量悬殊,无法阻止日军登陆。上午,全公亭方面登陆日军已达3000余人。南京大本营得悉日军登陆,“迅调浦东第62师主力、独立第45旅及新到枫泾之第79师攻击登陆之敌,并令新到青浦经67军向淞江推进,以资策应”。^①各部队虽遵令移动,但由于正值雨后,道路泥泞,又遇日机不断轰炸,中国增援部队行进迟缓,未等赶到,日军已在几乎没有阻挡的情况下源源登陆。日军在金山卫、全公亭的登陆成功,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夹击包围的危险境地,上海已势所难保。

七、上海失陷

日军于杭州湾源源登陆后,以第6师团主力沿沪杭铁路前进,另以一部直扑松江,企图攻击苏州河南岸中国守军之背后,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6日,敌先头部队到达米市渡附近,傍晚渡过黄浦江,冲破中国军队阻击,以大队人马向松江推进。7日,中国军队第62、第79师分别向亭林镇、金山城之敌发起进攻,但被击退。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鉴于日军主力已进至黄浦江右岸,迫近松江,决定将浦江右岸部队左移渡江,而以第67军吴克仁部守城,并阻止日军渡江。吴克仁部刚刚从豫北调来增援作战,集结未毕,被渡江攻城的日军各个击破,“松江、枫泾于11月9日同时失

^①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于敌手”。^①

7日,日军参谋本部为统一上海方面作战指挥,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编组为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意图尽快结束上海战事,包围歼灭集结淞沪的中国军队。至此,日军在淞沪战场投入的兵力已有大约30万人。

日军进占松江、枫泾后,又向西直指嘉兴、平望,沪杭铁路被敌击断,北面日军也已突破苏州河中国军队防线。为打破敌人的包围与巩固南京防卫,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左右两作战军向吴福国防线转移,以保卫南京,并以一部转移沪杭线方面阻击敌人。

中国军队开始由苏州河方面退却后,日军遂向苏州河以南和以西推进。11日晚,在南市及浦东担任掩护的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沦落。

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给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战略以沉重一击,使日本陆军和海空军遭到从“七七”开战以来从未受到过的打击和损失,迫使其不断增兵,把20多万日军吸引到长江三角洲地带,从而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对全国抗战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援。这次战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为沿海工业内迁、物资设备和企事业单位的转移、保存经济实力赢得了时间。中国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几十万人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拼搏中为国捐躯,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远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光辉的篇章。

但这次战役中,中国政府军事当局在战略指导上犯有错误。首先,上海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并不居于中国大陆的战略枢纽地带,因而上海之战在战略上难以起到转换全局的作用。从这个意

^①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义上说,它是不能同华北作战的意义相提并论的。上海地区接近海岸,向内是一片地势平坦、河网交错的狭小地区。上海市区又驻有日军,占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的日军,便于在此实施登陆,又可收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之效,对中国军队作战显然不利。上海左濒临长江口,右紧靠杭州湾,形成一个“凸”形边境,对日军的优势兵力而言,有凸形边境可资利用,就可以从上海的两翼实施登陆,进行战略包围,容易迂回成功。因此,上海抗战应当夺取先机,以果断的行动和优势兵力,一举彻底歼灭市区之敌。中国驻上海地区部队认识到这一点,在敌未大动前主动对市区之敌发起进攻。可惜,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和战不定,优柔寡断,在战斗发起后3次下令前线部队停止攻击,加之攻击力量不足,以致丧失先机,未能达成初战之目标。

次之,中国军队应有足够的兵力和火器的准备,部署于长江口岸和杭州湾沿线及其附近岛屿,并组织好后继力量,对抗敌军登陆,在敌军登陆过程中就给予歼灭性打击。但是中国方面在事前既无抗敌登陆作战之准备,又未组织好足够的后继力量,以致让日军在长江口沿岸登陆成功,逐次扩展攻势,造成对中国军队的致命威胁。再者,以中国军队的综合条件,完全不应当在上海郊区与敌军进行阵地抗击战,但中国70万大军却同敌军进行了长达几十天的阵地战,这种以己之短对敌之长的做法,使中国军队在日军海陆空强大火力下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每小时死伤辄以千计”,违背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进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会战,尤其是在淞沪这个特定地区,对中国是不适宜的。在达到一定的战略和战役目的后,应当适时转移兵力,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但南京军事指挥当局在战局逆转已无可挽回时,仍然大规模地增兵,自陷于被动。而在凸形边线两翼疏于防卫,特别是在最易实现战役展开、对上海形成迂回之势的金山卫地区疏于防守,以致日军

登陆成功,促成中国军队淞沪抗战最后失败,更是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当中国军队面临被包围的险境时,最高指挥又未及时下令撤退,“待部队溃乱、战线动摇时才被迫而撤退,因此不能为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① 仓惶之中,多年经营的坚固工事基本未能利用,使日军得以迅速扑向南京,对南京的防卫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提出和八路军出师抗战

一、洛川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卢沟桥的炮声点燃了全国抗战的烈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② 同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致电第29军将领宋哲元等,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③ 表示“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并“随时准备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④

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① 《陈诚个人回忆资料》,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②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原件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

③ 《红军将领请缨杀敌致蒋电》(1937年7月8日),原件存军博。

④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8日),原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10期。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在通电全国奋起抗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进行了探求。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要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就必须采取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外交,改良人民生活,加强国防教育,厉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建立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等项办法。”^①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初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为了促使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订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8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准备交付国防最高会议的有关国防意见,并相应拟出了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方案具体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给敌以反击,最后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和适当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兵器,给敌以决然的突击,避免单纯的阵地消耗战;(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和经济中心,设置坚强攻势,配备足够兵力,以钳制敌人;(5)一切防御阵地避免单线式,应缩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守备部队应采取积极的动作,切勿单纯的防守;(6)我军处于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争取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7)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之前后左右,以分散、迷惑、疲倦敌人,破坏敌之后方,以造成主力在运动中歼敌

^① 《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315-323页。

的有利条件。^①提案强调：“只有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②8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朱德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又就此一方案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补充说明。中共中央关于抗战战略和作战原则的重要建议，相当部分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采纳。

为适应全国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事变以来急剧变化的形势，确定领导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路线、纲领、战略、策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至24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张国焘、贺龙、林彪、徐向前等22人出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重要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战开始后出现的新形势。指出：7月7日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已经成为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也“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所以“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此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动员一切力量争

① 《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1937年8月），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第19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② 《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1937年8月），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第19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取抗战的胜利”。^① 根据这一任务，会上制定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为：

- (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二)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 (三)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 (四) 改革政治机构；
- (五) 抗日的外交政策；
- (六) 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 (七) 改良人民生活；
- (八) 抗日的教育政策；
- (九)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 (十) 抗日的民族团结。^②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主张的具体体现。为实现这一纲领，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党员和红军将士英勇地“站在抗日的最前列，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③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根据抗战以来敌我双方实力和战况的变化，提出了红军战略转变的问题。报告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要使红军的任务与抗战以来的战情相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及其领导下的抗日红军重心必须放在战区和敌后，为此规定红军在抗战中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创造抗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以下简称军科院)藏。

②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见《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324至329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军科院藏。

日根据地；第二钳制和消灭敌人；第三配合友军作战；第四保存和扩大部队；第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不是不要平原，它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运动战和向平原发展的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会上强调了这一方针，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从而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历史使命。^①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指出：一方面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要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主张，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他同盟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②

会议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如红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兵力使用以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在中国民族革命战争伟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对日后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实行全面、持久的抗战起了极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

为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改编,是抗战爆发前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双方在军队改编的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故至抗战爆发仍未达成协议。七七事变后,红军将士满怀爱国热情,多次发表通电,向国民政府要求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并于7月14日宣布自行改编。^①次日,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表示:愿立即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开赴抗日前线。^②

由于中共方面的一再催促,加上八一三后淞沪战场形势吃紧,各战场均需大量兵力投入,于是,国共两党在以往谈判的基础上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5000人。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左权任副参谋长,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红一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第74师等编为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主任

① 毛泽东:《红军改编命令》(1937年7月14日),原件藏军博。

②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第213页。

罗荣桓(11月,政训处主任改称政治委员,下同)、副主任肖华,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以及独立团和3个直属营,全师共15500人。红二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第27、28军等部改编为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弟,政训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琪,下辖第368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以及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共14000余人。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第29、30军等部改编为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以及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全师共13000人,加上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46000人。与此同时,还由各主力部队抽调部分部队组成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同年12月改称留守兵团),肖劲光任主任,下辖警备第1至8团、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团等部,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①

中国工农红军顺利改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为中国工农红军出师抗战奠定了基础。

三、八路军主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洛川会议和红军改编期间,正是日军向华北和淞沪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之时。尤其在华北,日军在平、津失陷后大举增兵,于8月中旬又沿平绥、平汉、平津3条铁路线向中国军队发起新的进攻。

^① 《第八路军战斗序列表》(1937年8月25日),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第536至538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为了配合国民政府军队保卫华北,中共中央早在8月上旬就已对红军出师抗日的行动步骤作出初步设想,拟以“三分之一兵力,以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察地区活动,威胁敌后方”。^①以后,随着战局发展,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又就八路军出师后的兵力部署作了进一步研究,决定: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之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以此为战略依托,向察哈尔南部、热河南部和河北西部发展。此一部署的要旨是使八路军主力在出师后能向平、津之敌之侧翼和后方深入展开,分割敌关东军与平津的战略联系。从侧后袭扰、牵制和打击日军,钳制日军的正面进攻,以此协同,配合友军作战。

由于华北战况日趋严重,红军改编后未等整编补充就绪,中共中央军委即按既定部署,令第115师为东进先遣队,于8月22日由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115师主力经韩城县川镇东渡黄河,至侯马乘火车沿同蒲路北进,日夜兼程直趋晋察冀交界地区。9月3日,第120师主力也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沿先遣队线向华北前线挺进。9月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前线指挥作战。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对八路军主力出师后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向各师发出电文指示,指出:敌在华北作战计划,以占领平津、南口、张家口之线为第一步,以占领沧州、保定、涞源、大同之线为第二步,以进占德州、石家庄、太原、归绥为第三步。但敌现有兵力疲劳,进入山区后,部队供应困难,重炮、坦克均不能发挥其威力。在此形势下,八路军为坚持华北局面,尽可能保障山西持久战,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为

^① 《洛、毛关于国防问题给矢、周、叶的指示》(1937年8月4日至5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军科院藏。

此,八路军在各方面须起积极模范作用: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战术,求得消灭敌之小部,兴奋友军,转变其死守、呆板之战术,造成持久胜利的发展局面,模范地遵守纪律,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对一切友军政权,取尊重合作态度;扩大本身,利用时间加紧必要之训练。具体部署是:120师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向左云方向袭击,并发动晋西北及绥东群众,首先组织宁武、朔县、神池、五寨、平鲁、右玉、林格尔、清水河、偏关、河曲、保德地域的游击队;王震率718团进至五台东北豆村镇、台怀镇地区,开展五台以北、以东等地区之群众工作。115师343旅控制上寨附近,以小部袭扰灵丘、涞源之敌;344旅位于阜平东北,随时协助343旅相机袭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游击队深入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预计,129师抵正太路以南,在辽县设后方机关,开展太行山脉工作。^①

遵照上述指示和部署,9月中旬,第115师主力进至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 and 冀西阜平地区;第120师主力于9月下旬进至宁武、神池等晋西北地区。总部和第102师358旅也于是月末进入五台。9月30日,八路军第129师整装完毕,由韩城、芝川渡过黄河,向山西抗日前线进发。

本章小结

七七事变,日军攻占平、津,使蒋介石及国民党统治阶层对日

^① 《朱、彭、任关于八路军作战指导思想与具体部署致各师电》(1937年9月2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军科院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妥协的幻想彻底破灭,中日关系的“最后关头”终于被突破。

8月7日,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政军要员云集南京,就全国性的抗战战略指导方针和作战部署进行了紧张的决策,决定开展“全面抗战”并实行“持久消耗”的作战原则。

国共谈判为世人所瞩目。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也由于国民党政府从抗日大局出发,双方就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前线作战,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完成。至此,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全面抗日战争在南北战场迅速展开。

第29军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首先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这是具有历史功绩的。但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却迅速失败,尽管因素较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第29军领导人幻想苟安的结果。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地区首辟东部战场。淞沪作战在开始之初规模并不大,但不到一个月便扩大为抗日战争的重心。中国几十万大军集中于上海周围这一地势平坦、河网交错的狭小地区,与装备、素质都居于优势的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华北战场因此降到次要地位。淞沪会战的结果,使中国精锐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这对于国民政府“持久消耗”的战略指导原则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失策。